

# 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 ——对明代河南归德沈氏家族的考察

李永菊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 在明初华北的移民潮中, 军户移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久经战乱的中原地区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对归德沈氏家族的个案分析, 探讨明代华北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这一个案研究表明, 在明代华北的地域社会史中, 军户家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 明代; 归德; 军户移民; 乡绅望族; 沈氏家族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8)01-0050-06

## 前言

明代的军户是特殊社会阶层, 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往有关明代军户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制度史方面, 如军户的来源、管理、义务、社会地位等问题<sup>1</sup>。近年来, 有些学者开始把军户放在地域社会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于志嘉关于江西军户的研究成果<sup>2</sup>。由于相关史料的贫乏, 对华北地区卫所军户的专题研究尚未展开。近年来, 笔者在河南发现了不少卫所军户的家谱资料, 对研究明代华北卫所军户与地方社会史都十分珍贵。本文在解读这些资料的基础上, 以河南归德沈氏家族为中心, 考察明代卫所军户的历史演变, 探讨明代华北地区社会转型的内在机制。

本文依据的基本资料是民国二十三年第八次重修的归德《沈氏家谱》, 共六卷, 内容包括历次修谱的谱序、派略世系、墓表、本传、诰赠文、谕祭文等, 现收藏于商丘谢集北街沈发岗家中。与此相关的重要资料还有《沈公家政》又名《文雅社约》, 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四库全书存书丛书, 作者是沈氏家族的第七代族人沈鲤, 共二卷, 内容不仅包括沈氏家族的各种家族事务, 而且涉及明代归德地方社会的诸多方面。

归德位于河南省东部, 相当于现在的商丘

地区, 是豫鲁苏皖四省交界之通衢。归德“实古睢阳名镇, 世称江淮保障, 南北咽喉”<sup>3</sup>，“为关陕喉衿, 江淮要冲, 古称重地”<sup>4</sup>，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经过元末的兵火战乱, 归德境内田地荒芜, 人口锐减, 多是无人之区, 归德在明初也由府降为州, 隶河南开封府, 统宁陵、虞城、夏邑、永城、鹿邑五县<sup>5</sup>。为了充实中原, 明朝一建立, 朱元璋就进行大规模的政府迁民, 主要包括山西迁民和军户移民。明前期的归德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 明中叶以后发展为定居社会, 很多移民的后代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在河南所管辖的八个府中, 归德府的文教事业最为昌盛, 明代归德府共中文、武进士 168 名, 占该府平均人口的 17/10000, 其比例之高, 居全省之冠。<sup>6</sup> 科举的成功造就了一批权倾一时的达官显贵与名公巨卿, 商丘县仅三品以上的官员就有“八大家”, 至今仍流传着“沈、宋、侯、叶、余、刘(周)、高、杨二家在后头”的民谚。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八大家”中至少有四大家的户籍在明初是军籍, 而本文考察的沈氏家族位居“八大家”之首。因此, 考察沈氏家族由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探讨明代华北地区的社会转型与秩序建构。

## 一、明初的军户移民及其生存状况

由于归德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南北咽喉”

[收稿日期] 2007-10-29

的重要作用,明朝一建立,朱元璋就在此设归德卫进行守备,辖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属中都留守司。在明初迁入归德的移民中,军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天顺六年(1462),归德州总户口1851户,其中军户有420户,占总户口的22.7%<sup>⑧</sup>。归德卫属于内地卫所,管辖的屯田往往分散在附近各州县境内,因而,归德卫与州县犬牙交错,“地方人民田土俱于归德卫四十九百户所官军营堡屯田相搀杂处”<sup>⑨</sup>。这种军民杂处、犬牙交制的状态,使卫所军户成为地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归德沈氏的始迁祖沈福二,就是在明初军户移民潮中奉诏迁入,以军籍隶属于归德卫。明初的军户移民,一般是从江南调拨江北,或从江北调拨江南。归德沈氏出自苏州府昆山县,世居昆山县城。元末,昆山沈道兴有二子,长子福一,次子福二。明洪武四年,“大臣有平章潘氏者,括取伪吴张士诚麾下旧军,蔓及道兴”。而此时沈道兴已老,不能行军役,按照次序,该长子福一代父行军役,但福二愤奋然曰:“有事弟子服其劳,吾父既不可以行,吾当代吾兄行矣!”沈福二代兄行军役时,把唯一的儿子沈铭留在原籍苏州府昆山县的家中,“独挈配王氏与其婿范贵渡江而北次扬州兴化县”,后调河南祥符,再调归德,始隶籍归德卫左所李百户伍下<sup>⑩</sup>。

归德地处中原,是重要的农耕地区,归德卫自然成为军屯密集分布的地方。明初迁至归德卫的军户主要以屯军为主,这些屯军一般都按定额获得屯田,维持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洪武二十二年(1389),沈福二占屯城东南一十五里邵家口处,“辟草莱而居,里不过一厘,田不逾百亩”<sup>⑪</sup>,平时固定驻扎一地,战时听从调遣。同为军户身份的归德刘氏“受田于闕伯台右……无事则耕而食,有事则行役焉”<sup>⑫</sup>。拥有百亩之田在归德算是很少了。明万历年间,随着人口的增多,“百亩能活八口身,立锥无地可怜人”<sup>⑬</sup>。由此推断,在地广人稀的明初,拥有百亩之田仅能够满足生存问题。

为了确保军队的及时补充,明代的军户必须世袭,“役皆永充”<sup>⑭</sup>,“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sup>⑮</sup>。在明初严格的清勾政策之下,归德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保持着经常

的联系,待卫军年老或去世之后,继役者常在原籍军户中进行勾补。沈福二之后的两代人中每代仅有一名男丁,即远在苏州府昆山县的儿子沈铭和孙子沈祥。由于沈福二在河南只生下一女,没有儿子,待沈福二年老不能行军役时,远在昆山的儿子沈铭不得不代父行军役。洪武三十四年(1401),沈铭不幸在靖难之役中战死,此时沈铭的儿子沈祥只有十七岁,即补充入伍。在永乐八年(1410)、十二年(1414)、二十二年(1424),“三扈文皇帝北征,俱随其主帅渡沙漠而还”<sup>⑯</sup>。

卫所军户在前几代人数较少,相对来讲军役负担繁重,生存状况较为艰辛。明清之际,归德刘氏后人刘榛在回忆沈氏与刘氏起家之艰难时说道:“予与沈氏皆以军戎来归德,创造之艰难与有同焉;而三世四世之间不过三数人,又不显,两家亦同”<sup>⑰</sup>。嘉靖《归德志》也有相关记载,“国初,法尚严峻,(胡元)凯为军胥,备极艰苦”<sup>⑱</sup>。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原籍军户不愿与卫所军户建立长久的联系,如胡元凯,江西吉水人,后调至归德卫前所,“既老,勾丁原籍,檄下,族人率逡巡避之”<sup>⑲</sup>。由此可以预见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尤其是宣德以后,在国家鼓励卫所军户落地生的政策背景下,卫所军户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 二、置产、寄籍、孝友与科举入仕

卫所军户经过几代的繁衍,军籍子弟逐渐增多,而实际服军役又是何其少数。除了正军服军役外,卫所军户还有大量军余,他们在卫所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明洪武年间,始祖沈福二在归德卫屯所居住。明正统以后,沈氏家族的人口逐渐增多,第四代共有三男名丁,即沈祥的三个儿子沈忠、沈英和沈杰,第五代共有十一名男丁,第六代共有三十一名男丁。随着家族人口的日益繁衍,“屯所不能尽居也”,沈氏家族遂有人置产于归德州郡城东南七十里界沟集,又有置产于城北四十里染湛集<sup>⑳</sup>,加上屯所,沈氏共有三处聚落,“盖并其屯所而三焉”。其实,明中叶以后,卫所军户置买民产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嘉靖年间,归德府宁陵县的“田额不逾四千顷,而鬻入于军者千有奇”<sup>㉑</sup>。

明政府规定以官军户下多余人丁附籍有

司,其先决条件必须是购置有附近民产。因而,移居置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寄籍军户的产生。长门沈忠这一支即是典型的寄籍军户,沈忠的儿子沈瀚“世居城市,以便儒业”,“虽为归德州学生,实食廩于虞城县学,因寄籍虞城之待宾一乡,为民籍”<sup>21</sup>。“寄籍”又称“附籍”,根据于志嘉的研究,附籍军户若得因购买民地而另立民籍,违反了军户不得分户的规定,她认为改为民籍或许并非真具有民籍,只是用来凸显附籍军户与卫所军户之不同而已<sup>22</sup>。沈瀚这一支即是如此,通过购买民田,随田产移居到卫所周边的虞城县,成为寄籍军户,仍属军籍。

成化七年(1471),沈忠又因其孝顺闻名,被列入地方志中的“孝友”,并获“永蠲其家”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被列入嘉靖《归德志》“孝友”中的五个人全部都来自卫所。除沈忠之外,还有任贵,“世为沛人,父恭义军于归德”;杨敬,归德卫前所人,其父亲在洪武年间亡于行阵;吕仲和,归德卫右所人;□礼,百户义之弟<sup>23</sup>。可见,成为孝友也是军户提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一种常用策略。

此外,还有一些通过入赘、圈地等其他办法逐渐改善生存条件的军户,如考城王荣,至永乐之时,从军二十余载,“军之劳不可胜言,以辛苦难状,遂逃至睢,而赘于阙门”。之后王荣又在“永不起科”的吸引下,圈地自立门户,王荣“辞阙氏,而来考邑迤南凤烟村圈地十八顷,遂世居焉”,逐渐走向耕读世家。明万历年间,归德名宦吕坤还曾向王氏家族中的渔王公求学<sup>24</sup>。

移居城市、另置产业、入附近县学、寄籍他处、成为孝友等一系列行为,为长门沈忠的后代参加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在沈氏家族第五代人中,沈瀚中成化甲辰(1484)进士,任福建省建宁府知府,成为沈氏家族中第一个获得进士功名的人。此外,沈瀚中成化丙午(1486)举人,沈泽、沈濬俱为诸生。上述四人之中,除了沈瀚是沈杰的儿子外,其余三人都是长门沈忠的儿子。可见,沈忠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为其后代的科举入仕奠定了基础。沈瀚在会试南宫后就去世了,并没有给所在支派带来荣誉,沈忠则成功地把子孙带入了仕途,其所在支派自然成为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明成化年间,随着

科举的成功,“沈氏始大”<sup>25</sup>,“衣冠显贵者渐多”<sup>26</sup>,沈氏家族逐渐从军户移民转变为地方望族。正德六年(1511),流贼杨虎攻破虞城,沈瀚这一支派为躲避战乱由虞城迁回归德州郡城,并置产业,“以流贼之乱复还居郡城,置世业”<sup>27</sup>。此时,沈瀚这一支派仍没有摆脱军籍和寄籍的身份。

明正德戊寅年(1518),沈瀚去世,沈氏家族“门户盖稍稍衰焉”。嘉靖年间,沈瀚的孙子沈鲤把沈氏家族推向了顶峰。沈鲤(1531-1615)以军籍身份中嘉靖乙丑科(1565)进士,选庶吉士,兼翰林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万历十二年(1584)冬,拜礼部尚书。万历皇帝对沈鲤十分赞赏,万历朝首推两贤相即沈鲤和王家屏。因科举中式而成功步入仕途的家族成员,常常又因此带动整个家族的兴旺。明隆、万之际,沈氏子孙“恩例授冠带与衣冠而儒者又复数十人”,此时的沈氏家族“复兴矣”<sup>28</sup>。随着功名宦绩的显赫,沈氏终于在万历年间摆脱了“待宾之籍”与“归德卫军籍”。嘉靖二十四年(1545),归德由州升府后,设商丘县,并于万历二年(1574)成立商丘县儒学,万历四年(1576),沈鲤“诸孙又改入商丘县丰一等里,而待宾之籍与归德卫军籍俱除矣”。但是,户籍的变化并非泛及沈氏所有族人,“其非建宁公(沈瀚)子孙者尚军籍如故”<sup>29</sup>。此时,沈氏家族已经从军户移民转型成为乡绅望族,位居商丘“八大家”之首。

通过沈氏的例子可以看出,军户移民经过几代的繁衍,开始采取一系列的策略,为科举入仕奠定了基础,并最终通过科举入仕大大提升了社会地位。于志嘉认为,明朝在政策上是偏向于为军户子弟仕进提供机会的<sup>30</sup>,就归德沈氏的个案来说,没有什么迹象可以显示科举入仕与军户子弟享有的优待政策直接相关。不过,明代军户子弟读书求学往往具有较好的条件,再加上脱免军役愿望的驱动<sup>31</sup>,遂使军户子弟在明代科举入仕者中占有较高比例。沈氏家族的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除了沈氏家族之外,侯氏、刘氏、叶氏三个家族在明初均隶属归德卫军籍,至明后期,这些家族都发展成为地方望族,成为商丘“八大家”的成员。如侯氏家族的始迁祖侯成于洪武初年奉诏由杞县迁入商丘,以军籍隶属归德卫,至万历年间,侯氏家族

在两代人出了四名进士，即侯执躬、侯执蒲、侯洵和侯恪，“父子兄弟同朝……吾中州望族之最，夙称侯氏……可谓盛焉”<sup>32</sup>。叶氏家族始迁祖叶受于明洪武中以从军占籍商丘，万历以后，“叶氏为睢阳望族，科第连绵，簪纓累世”<sup>33</sup>。可见，从军户移民到乡绅望族是明代归德社会变迁的重要趋势。

### 三、地域支配的多元策略

科举的成功成为沈氏家族由军户移民转向乡绅望族的重要契机，但并非沈氏家族占据地域支配地位的唯一途径。明代沈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沈鲤在获得高级功名之后，长期隐居于乡里，致力于文教事业与家乡建设，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务，逐渐确立了其对社区生活的支配权，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其一，祭祖修谱、整合族人。

随着人口的繁衍，家族内部支派的分化，明后期沈氏家族的族内关系较为涣散。沈鲤指出：“吾族自八世以来，散处四方厥指藩庶异时，惟各自行礼，故或先或后，率不相值，久之有终身不能识面者。”岁时祭祖，“不免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而过其他壘，有睨而去之者，若谓其远矣”<sup>34</sup>。对于忌日，“奈何于父母则知忌，而自祖以上顿不能以一盃润丘壤耶”<sup>35</sup>。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沈鲤开始进行拜祀始祖、置办祭田与纂修家谱等家族活动。沈鲤聚族曰：“继今后宜即吾始祖墓前设壇为位，萃八世之神灵合享之，而以大宗之子献，以行辈特尊者分献，献毕而礼成”<sup>36</sup>。沈鲤还置办祭田，希望范文正公的贍族义田能够行之北方，并首次纂修《沈氏家谱》。

沈鲤倡导以拜祀始祖为中心的家族活动，无疑整合了无论军籍还是民籍的所有沈氏家族的成员，随之而来的是沈鲤给整个家族带来的各种利益和特权。万历二十八年（1600），沈鲤在七十岁大寿时不禁感慨道：“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称饶给，而近年来，乃人人有冠服荣身，有良田美宅，资财足用，出门有车马仆从，从者至彼此不能相识，可谓极盛”<sup>37</sup>。

此外，沈鲤还于万历丙申年（1596）创办商丘“笃亲会”，不仅包括父亲之族，还包括母亲之族，“皆父母之族”，“姑舅姨母之党”<sup>38</sup>。沈

鲤母亲所在的宋氏家族是由土著居民发展起来的乡绅望族，位居商丘“八大家”第二位。由此可见，沈鲤创办“笃亲会”的实质在于联合地方望族，结成稳固的家族联盟，这种团结父族、联盟母族的策略无疑有助于构建地方权力体系。

地域支配权的获得，不仅与科举考试的成功和家族内部的建设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对地方社会文化资源的控制息息相关。科举的成功保证了族内优秀成员拥有较多的管理家族事务及地方事务的机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同时也十分有利于获取家族以外的政治、经济权利和资源。

#### 其二，镇压动乱、修筑沈堤。

嘉靖三十二年（1553）秋七月，远襄“土贼”师尚诏、王邦用等三百余人，起事于柘县城城北，旋即攻破归德府，放其狱囚，夺其帑藏，屡败官军，先后攻克柘城、鹿邑、睢州等地，河南、山东、南直隶三省为之震动。与沈鲤有师生情谊的归德府宁陵县吕坤后来追忆道：“师尚诏初起远襄城时，家中显然屯聚者曾有百人。一出归德，便有三千余人，离鹿邑、柘城，则万余人矣”<sup>39</sup>。在镇压这场动乱中，沈鲤起着重要作用，师尚诏攻陷归德后，“已而西去”，沈鲤“策贼必再至，急白守巨捕杀城中通贼者，严为守具，贼还逼见有备去。奸人倡言屠城将驱掠居民，鲤请谕止之，众始定”<sup>40</sup>。

明万历年间，黄河中下游多次决口泛滥，民不聊生。“黄河为商丘大害，土弱地势卑，民贫无恒产。百年之间，轻者三溢，重者两溢，溢则房舍、鸡犬湮没一空”<sup>41</sup>。沈鲤为民请命，奏请奉旨修筑了两条大堤。一道是西起自荥城（今荥阳），东止于洪子湖（今洪泽湖），全长800余里。之后，沈鲤又修筑“南北便堤”一道，北顶东西黄河大堤，南由商丘古城北郭外迤向东南，经会亭驿（今夏邑会亭）至永城曹家洼，计长180里。这两道大堤由于是沈鲤负责修筑的，因而被称为“沈堤”。自“沈堤”修筑后，“河南州县始免冲决”<sup>42</sup>。沈堤无疑给地方社会增加了一道安全保障，沈鲤的声望也随之提升，至今民间仍流传“沈阁老修沈堤”的故事。

#### 其三，结社立约，移风易俗。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商丘社会风俗发生了较大转变，奢侈浮靡成为时尚，整个社会在追求奢华攀比中逐渐失去了明前期那种古朴的民

风。为解决风俗恶薄的问题，沈鲤与其弟沈麟（1535-1616 监生，任鸿胪寺署丞）及同乡其他三位“君子”于万历年间结社于商丘东南一里处文雅台，并制定《文雅社约》“期挽世风，稍还古昔”<sup>43</sup>，对家乡各类乡俗进行教化。范围之广，涉及书筭、宴会、称呼、揖让、交际、冠服、闲家、馭下、田宅、器用、劝义、明微、冠婚、丧祭、身俭、心俭、劝施迂谈、义学约、女训约言、垂涕衷言、社仓议、族田约、乡射约、笃亲会约、墓享仪、沈氏祠堂生忌单、孝女传等各个方面。

沈鲤认为化导乡俗是士大夫应有的责任。对于乡俗，“理论不能止，法制不能禁，其犹士大夫之责”，但对于“化导乡俗”，“士大夫犹未有倡之者”，因而，沈鲤鼓励士大夫教化乡俗。同时，沈鲤还鼓励士大夫多行义事，如结义仓、积社谷、睦族众、设义学、建义冢、施寒衣、施药方等，“一以劝善、一以厚俗”。沈鲤身体力行，约文雅社五人，在商丘西门一带设义仓，并于郡城四门各置义学一所，在严寒之季协力周济无寒衣者<sup>44</sup>。

沈鲤通过“文雅社”在地方社会积极推行礼仪教化，对社区生活进行全面而广泛的干预，构建地方社会的统治秩序和文化规范，集中反映了商丘乡绅推行礼仪教化的社会控制模式。

#### 其四，改革盐政、减轻漕运。

沈鲤与时为户部尚书的商丘宋纁共同策划，将归德府盐政改隶山东，并减轻归德漕运人力，除百年积困。“盖谓开封、归德，原系山东行盐方所，至成化间，始改隶山西河东。其盐价岁费三十余万，而盐味苦恶，商人复杂以硝碱，故民弃置不用，又倍价买山东长芦之盐食之。而与鬻贩私行，昏夜操戈，虞有不测。”后经沈、宋二人努力，将归德府盐政复改隶山东，此后，“民无私贩之嫌，道无称兵之患，而一时所省盐金，岁可三十余万云”。归德卫运船七十二只，原非正额，只因成化间暂为徐泗二卫代运，相沿日久，以致归德军余驾运不前，逃亡伤死，“复自糟运都御史杨公、李公交章题请，欲行分散，乃宋、沈二公，则又为题覆从臾，散之临清各卫。事体就使，彼此均停，而百年积困，一旦若挈而去之矣”<sup>45</sup>。这些有利于家乡建设的举措无疑扩大了沈鲤等乡绅及其家族在地方上的社会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盐政和减轻漕运这

两件事情上，沈鲤都是和宋纁共同参与其中。宋纁就是前文提到的沈鲤的母族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嘉靖己未（1559）赐进士，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陕西、应天、山西巡按，顺天府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保定巡抚，南京户部右侍郎，北转左总督，万历十四年，升户部尚书，后又升吏部尚书。正是由于宋纁的功名宦绩，宋氏家族才成为商丘的著姓望族，位居“八大家”第二位。沈氏和宋氏家族不仅建立了稳固的婚姻联盟，两个家族的代表人物还共同参与地方事务，乡绅望族之间的密切合作无疑有利于构建地方权力结构，巩固其在地方社会的支配权。

以上几项地方事务还不能囊括沈鲤的全部活动，但足以窥探出沈鲤在地方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角色。商丘沈氏家族正是通过沈鲤的政治影响力及其在地方社会上的多元策略才得以传承不坠，“自相国鲤以来为宋之巨族”，“连阡陌而田，比闾闾以居”<sup>46</sup>，位居商丘“八大家”之首。

## 结 语

形成于明后期的商丘“八大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明初隶属军籍。为了应付各种军役，军户家庭在前几代人丁单薄，生活困苦。随着军户家族人口的繁衍，许多军户子弟纷纷移居置产，成为寄籍军户，并通过一系列手段走上了科举入仕的道路。科举的成功给军户家族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使其成为地方上的乡绅望族，并逐渐摆脱军籍的身份。随着身份角色的转变，他们积极致力于家族建设，倡导礼仪改革和移风易俗。与此同时，由军户移民发展起来的乡绅望族开始与其他乡绅望族联合起来，广泛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解决地方社会的实际问题。当地乡绅在家族姻戚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不仅加强了地方精英对社区生活全面控制，而且有助于构建起以士大夫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因而，乡绅望族地域社会支配权的确立，不仅体现了权力结构的变化，更蕴含着社会文化规范和国家秩序转型的意义。总之，通过对明代河南归德沈氏家族的个案分析，我们既可以发现明初的军户移民摆脱军籍转变为乡绅望族的过程，也不难看出乡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与获得地方支配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历史背景下，归德地区由明前期军民混居

的移民社会，逐渐转化为明后期以乡绅望族为主导的地方社会。

### 注释与参考文献：

<sup>1</sup>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李龙潜：《明代军户制度浅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sup>④</sup>参见于志嘉：《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7年，1-53页。于志嘉：《明清时代江西卫所军户的管理与军役纠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1年，833-887页。

<sup>④</sup>嘉靖《归德志》卷五《官师志·卫僚》，天一阁本。

<sup>1/4</sup> 嘉靖《归德志》卷二《建置志》，天一阁本。

<sup>1/2</sup> 嘉靖二十四年（1545），归德升州为府，辖1州8县，即睢州、商丘、宁陵、夏邑、鹿邑、虞城、永城、考城、柘城，其中商丘县为嘉靖二十四年新置，是府治所在地。

<sup>3/4</sup> 参见赵广华：《明代河南科举与人才的消长》，《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1月。

<sup>⑧</sup>嘉靖《归德志》卷三《田赋志·户口》，天一阁本。

<sup>⑦</sup>嘉靖《归德志》卷三《田赋志·马政》，天一阁本。

<sup>⑦</sup>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⑤</sup>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11</sup> 刘榛：《虚直堂文集》卷八《刘氏祭田碑记》，清康熙刻本。

<sup>12</sup> 吕坤：《宗约歌·戒诡地》，转引自马涛：《吕坤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1页。

<sup>13</sup>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役法》，中华书局，2000年。

<sup>14</sup> 《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凡立户收籍》。

<sup>15</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16</sup> 刘榛：《虚直堂文集》卷八《刘氏祭田碑记》，清康熙刻本。

<sup>17</sup> 嘉靖《归德志》卷七《人物志·游寓》，天一阁本。

<sup>18</sup> 嘉靖《归德志》卷七《人物志·游寓》，天一阁本。

<sup>19</sup> 嘉靖《归德志》记载为“染湛集”，《沈氏家谱》记载为“冉站集”。

<sup>20</sup> 宣统《宁陵县志》卷十一《艺文志·仁政碑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sup>21</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22</sup> 参见于志嘉：《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与军户分户》，《顾城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80-104页。

<sup>23</sup> 嘉靖《归德志》卷七《人物志·孝友》。

<sup>24</sup> 考城《渔王氏族谱》卷一《谱序规则·王氏家谱始序》，1954年。

<sup>25</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26</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27</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28</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29</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一《沈氏家谱序》。

<sup>30</sup> 参见于志嘉：《明代军户の社会地位について——科举と任官において——》，《东洋学报》第71卷第3、4号，1990年，转引自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地方势力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sup>31</sup> 根据商丘《侯氏家乘》卷一《载籍·河南人物通志》记载，崇祯三年（1630），侯洵官至兵部侍郎，试图把侯氏的出身戎籍改掉，但被侯执蒲修书制止，侯执蒲“家故军籍，子洵佐司马欲脱之，执蒲书止之，目若人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以为辱，如祖宗何？卒不易二事，至今卿里传为美谈云。”

<sup>32</sup> 商丘《侯氏家乘》卷一《商丘侯氏家乘序》，版本不祥。

<sup>33</sup> 商丘《叶氏家乘》卷七《封君公暨□太孺人双寿文》，民国八年版本。

<sup>34</sup> 沈鲤：《沈公家政》卷下《墓享仪引语》。

<sup>35</sup> 沈鲤：《沈公家政》卷下《沈氏祠堂生忌单》。

<sup>36</sup> 沈鲤：《沈公家政》卷下《墓享仪引语》。

<sup>37</sup> 沈鲤：《沈公家政》卷下《七十岁龙江老人书》。

<sup>38</sup> 沈鲤：《沈公家政》卷下《亲会约序》。

<sup>39</sup> 吕坤：《去伪斋文集》卷七《展城或问》，四库全书存书丛书。

<sup>40</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六《沈鲤本传》。

<sup>41</sup> 乾隆《归德府志》卷十四《水利略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sup>42</sup> 归德《沈氏家谱》卷六《本传九》。

<sup>43</sup> 沈鲤：《沈公家政》目录《文雅社约总目》。

<sup>44</sup> 沈鲤：《沈公家政》卷上《劝义十一》。

<sup>45</sup> 康熙《商丘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归德府改盐停运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sup>46</sup>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十《沈季宣墓志铭》，四库全书存书丛书。